

论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之遗民心态书写

尚鹏*

上海大学文学院

摘要

民国二十二年（1933）陈夔龙适逢重宴鹿鸣之期，征和海内，成为当时清遗民文化圈的一场盛事。清遗民借这场重宴鹿鸣唱和的“表演”，书写出自己于清民易代的隐微心态。参与唱和的大多都是身负前清科举功名的遗民及旧式文人。他们延续清代重宴鹿鸣唱和的传统，通过一唱众和的形式，回溯从光绪元年（1875）恩科中举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宴鹿鸣间的历史，表现出对于科举制度的缅怀与昔日功名的眷恋。时殊世异，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已经从传统的主题“耀科名而彰人瑞”转变“为汐社、月泉更添一故实”。清遗民通过遗民话语系统，表现出与历朝历代相似的故国愁绪，特别是非遗民受唱和背景与投赠对象的影响，亦表现出一致性的特征。在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的背景下，陈夔龙等遗民乃至旧式文人通过唱和沟通声气，保存旧体诗词创作的薪火，并表达出对以经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失传的担忧。

关键词：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遗民

* 尚鹏，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此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唱和诗词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258）阶段性成果。

On Chen Kuilong's Poetry Exchange of "Rejoin the *Luming* Feast" and the Mentality of the Surviving Adherents of the Qing Dynasty

SHANG Peng

College of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Chen Kuilong rejoined the "*Luming* Feast" and the poetry exchange in 1933. Most of the poe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activity were the survivor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y continued the tradition of "Rejoin the *Luming* Feast"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raced back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displaying their nostalgia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ir attachment to past achievements and fames. As times have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theme of Chen Kuilong's "Rejoin the *Luming* Feast" has been changed from celebrating the honour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o the theme of the surviving adherents of the former dynasty. They showed the same mood of the country as in previous dynasties through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surviving adherents of a former dynasty. Chen Kuilong and other deceased citizens expressed their concern about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represented by the study of classics under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Chen Kuilong, Rejoin the *Luming* Feast, poetry exchange, surviving adherents of a former dynasty

引言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延续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选拔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并未就此戛然而止，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旧式文人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与价值评判。民国时期，在前清获得科举功名的旧式文人以编纂师友同年录、举行周甲“重游”活动¹与刊刻周甲“重游”唱和集，纪念昔日功名，联络前清科举交谊，其中“最出名的是曾反对废止科举的清末大臣陈夔龙的《庸庵尚书重赋鹿鸣集录》”²。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号庸庵，贵州贵阳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官至直隶总督。进入民国后选择“遁世海上，闲与同年冯梦华、沈乙庵诸君结社联吟，乐数晨夕”³，以逊清遗民终老。民国二十二年（1933），陈夔龙“适值重宴鹿鸣之期，感赋四律，征和于海内各诗家，续又溯洄前韵四律，答谢和诗各家”⁴，“一时耆宿与夫门生故吏姻娅交游，无有遐迹，匪咏斯和”⁵。唱和结集的《庸庵尚书重赴鹿鸣集录》，收录 237 人 1026 首诗作，其人数之多与作品之富在当时周甲“重游”唱和中极为罕见。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⁶，成为民国时期清遗民文化圈的一场盛事。结集的唱和作品，打破个体“独吟”创作的限制，透露出清遗民“旧人物入新时代”⁷的隐微心态。这种心态是清遗民所共有的，他们借重宴鹿鸣唱和的形式来加以展现，是群体性的“表演”。

¹ 周甲“重游”活动，包括重游泮水、重宴鹿鸣与重宴恩荣，它们通常会伴随唱和活动，并将唱和诗词作品结集刊刻。

² 刘海峰：《科举学的起承转合——科举研究史的千年回顾》，《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第210-222页。

³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李立朴等编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657页。

⁴ 蔡云万：《蛰存斋笔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⁵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27页。

⁶ 陈夔龙光绪元年乙亥（1875）恩科贵阳乡试中举，按照惯例，他应与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正科的举人一起参加六十年后，即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重宴鹿鸣纪念活动。

⁷ 樊增祥：《樊樊山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66页。

一、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与科举情结

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 延续清代重宴鹿鸣唱和的传统⁸, 通过重宴鹿鸣的特殊主题, 唤醒相似的科举记忆, 以征和的方式展现出旧式文人共同的科举情结。

“重宴鹿鸣”即“中举之人届周甲六十年, 适其乡试中式之科, 获准与新科举人一起赴鹿鸣宴, 称重宴鹿鸣, 或重赴鹿鸣。是为清代之创制, 实为加惠老年科第人之恩典, 荣光之极。”⁹它与重游泮水、重宴恩荣都是清代特有的科举礼仪制度, 表现出当时社会“耀科名而彰人瑞”¹⁰的尊老敬学意识。重宴鹿鸣需要文人兼备中举早与享寿长的两个特征, 缺一则不可。以清代著名文人袁枚为例, 他曾替彭启丰作神道碑, 道: “倘假一二年, 重宴鹿鸣、琼林, 岂非熙朝盛事, 而天偏靳之。”¹¹内中惋惜懊恼之情, 溢于言表, 而他自己亦是如此, 乾隆三年(1738)中举, 年仅二十三岁, 嘉庆二年(1797)谢世, 享年八十二, 仅差一年, 不得重宴鹿鸣, 前后吻合, 宛若文讖, 可见重宴鹿鸣之难遇。据清末文人吴振棫统计“科甲出身, 重赴鹿鸣宴, 已不易得, 本朝二百余年不过数十人”¹², 清代重宴鹿鸣的人数极少。因其难遇与稀见更加凸显出重宴鹿鸣所赋予的荣光。重宴鹿鸣通常伴随着文人唱和, 多以一唱众和的形式对主人翁的功名之荣与享寿之高进行称颂。清代重宴鹿鸣唱和结集存世较少, 目前经眼的仅田毓璠《淮安重赋鹿鸣唱和集》、董岱《重宴鹿鸣诗集》与徐棻《鹿鸣雅咏》三部。其他作品多散见于文人别集, 需要经过系统的整理, 才能恢复当时重宴鹿鸣唱和的原貌。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光绪帝颁布上谕“自丙午科为始, 所有会试一律停止, 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¹³以来, 新式学堂教育迅速发展并日渐普及, 在崇洋重新的人才观念下, 科举功名不再受到重视, 正如罗桑彭所云“旧日科名, 今多视为土

⁸ 赵永翔:《清代“重赴鹿鸣宴”制度》,《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第65-69页。

⁹ 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0页。

¹⁰ 陶澍:《陶澍全集》奏疏2,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05页。

¹¹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8页。

¹² 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87页。

¹³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66页。

直，然礼教中人仍重视之，则敝帚尚在，不妨自珍也”¹⁴。尽管旧式文人在民国时期依然延续着清代重宴鹿鸣的传统，每逢自己中举六十周年，广邀师友同好加以庆祝，但是时殊世异，旧式文人周甲重游的纪念行为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已从“殊不易逢”变得“颇嫌腐旧”。重宴鹿鸣原本由朝廷组织加以公开表彰的官方活动转变为文人自发组织的私人行为，特别是仪式化步骤的简化省略，活动的主要内容只剩下文人的雅集唱和。陈夔龙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宴鹿鸣唱和，上距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除已有28年，亦已是1911年辛亥革之后22年。从晚清到民国，社会、文化、身份的转变，带给这些逊清遗民乃至旧式文人“沧桑”的生命体验，金保权在和诗中写道“梦里一周甲子过，人间万事尽沧桑。老夫此际谁同看，试与山舟细较量”¹⁵，与嘉庆十二年（1807）梁同书的重宴鹿鸣唱和相比，陈夔龙的重宴鹿鸣唱和因“今国体已更，科举早废，情事迥殊”，从“一炷心香祝圣虔”¹⁶“朝瑞无忘咏太平”¹⁷等歌颂太平盛世的基调中清醒，带着几分风景皆非的苦涩感。这是民国时期遗民乃至旧式文人在重宴鹿鸣中的共同感受。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帝制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非科举之能出人才，实人才之争趋于科举”¹⁸，文士藉科举考试来改变个人命运，实现人生价值，此乃必由之路。虽然晚清时期科举制度饱受争议，但是直至光绪时期废除科举制度，很多文士依然坚持推行科举制度，特别据黄金真、林坤的研究可知，陈夔龙认为“科举制度是立国安邦的根本典章，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¹⁹，明确反对废除科举制度。重宴鹿鸣本身是依附于科举制度而存在，是清代特有的科举礼仪，在废除科举制度后，重宴鹿鸣成为文人追忆科举岁月的重要媒

¹⁴ 罗桑彭：〈和豫泉叔重宴鹿鸣诗次原韵〉，《正风》，1937年第3期，第264页。

¹⁵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40页。

¹⁶ 梁同书：《频罗庵遗集》，出处《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¹⁷ 严元照：《柯家山馆遗诗》，出处《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85页。

¹⁸ 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64页。

¹⁹ 黄金真、林坤：〈陈夔龙科举观考述〉，《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70-73页。

介, 文人在此唱彼和的交流过程中透露出缅怀科举制度、眷恋昔日功名的真实心理。陈夔龙的重宴鹿鸣唱和, 参与的人员大多身负前清的科举功名。据《庸庵尚书重赋鹿鸣集录》统计, 参与唱和共 237 人, 其中科名可考者 151 人, 进士 57 人、举人 34 人、生员 26 人, 而且有 89 人参与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陈夔龙的重游泮水唱和²⁰。他们大多是晚清耆宿, 身上带有科举考试的烙印, 早年怀揣“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的美好理想, 投身于科举考试中, 中年遭逢科举废除、家国剧变, 即使身在民国, 依然对科举功名难以释怀, 其中如张其淦、朱家驹、华世奎、林葆恒等人均有重游泮水、重宴鹿鸣之举。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²¹, 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实际上就是依托于陈夔龙的人际关系而存在, 受到参与唱和者身份的限制。虽“一时耆宿与夫门生故吏姻娅”皆有所和, 但“同年”“门生”“受业”“年侄”等身份的介入, 让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呈现出复杂的科举关系网络, 陈夔龙是整个关系网络的中心, 所有的话语需要围绕陈夔龙的原唱展开。

陈夔龙通过对光绪元年(1875)恩科中举时的场景描绘, 将个人的经历与国家命运相连, 唤醒从晚清至民国他所经历的六十年间的历史记忆。他在首倡时以“回忆槐花旧日黄”²²句, 通过追忆“槐花黄, 举子忙”这个熟悉的场景, 营造出举子应试时的氛围, 进而突出个体的细节, 如“科名草绿报春晖”与“梁园选榜人犹在”, 并以自注的形式, 具体地描绘两句所要展现的场景。前者“赴宴归来, 先母姜夫人率子祀先, 喜极而泣”, 勾勒出当日中举后陈夔龙母亲姜氏祭告祖先, 举家沉浸在喜悦氛围中的感人场景。后者“癸卯河南乡试, 余充监临, 是科撤棘后, 乡举遂废”, 强调陈夔龙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河南乡试, 见证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的独特经历。和作也以相应的表达形式重复这些场景。前者如

²⁰ 陈夔龙民国二十一年(1932)重游泮水唱和, 结集为《璧水春长集》, 共有 104 人参与, 诗作的数量与参与的规模远不及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宴鹿鸣唱和。

²¹ 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 李猛、李康译,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第 133-134 页。

²²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中)》, 李立朴等编校,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4 年, 第 368 页。

邱翊华“传得读书真种子，蟾宫捷报慰春晖”²³，并注“公八龄失怙，有劝学贾者，姜太夫人未允，力延师课读”；亦如杨蔚“捷报人来匹马飞，十分喜气溢慈闱”²⁴，注有“公赴宴归来，姜太夫人率子祀先，喜极而泣”。后者如“癸卯监河南乡试，后科举遂废”²⁵、“公曾充癸卯科河南乡试监临，嗣后科举遂废”²⁶、“科举停于甲辰，公知是科贡举”²⁷。这些经历明显为陈夔龙个人所有，其他作者很难亲眼目睹，但是和作受原唱影响，将陈夔龙私人性的感受公开化，成为创作的重要素材，反复提及，强化整体的氛围，将陈夔龙个人经历与科举制度的微妙关系加以凸显。这也切合了重宴鹿鸣唱和，往往围绕主人翁而展开，以一唱众和的形式，引领整个创作的风向，特别是和作受原唱的影响呈现趋同化的倾向，进而有效地加强了整体的氛围，突出这一诗歌创作场景的特点。

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更多是作者自身对于昔日应试场景的追忆。他在原唱（其二）中写道“当年恩榜庆飞龙，奉使双星曜锁闱。毕卓通才便腹笥，张华博物副腰围。浓圈墨笔间蓝笔，暗点朱衣赋翠衣。岂有文章惊海内，科名草绿报春晖。”²⁸此诗回忆光绪恩榜的座师毕保厘、张清华与房师谢绍曾以及当时的诗题“山色朝晴翠染衣”“焕乎其有文章”，旧梦重温，历历在目。成功的经历让人难以忘怀，失败的情景同样刻骨铭心，章榎和诗中有句“嗟余亦获秋田隼，册二科名怅落晖”²⁹，并有句下小注云“榎九试始中，双亲弃养，念及潜然”；吕道象和诗云“学殖荒芜乏片长，迟公十载捷名场”³⁰；吴承烜和诗亦云“墙面二南思夏屋，灰心三北战秋闱”³¹，言及自己曾“十战秋闱”；金鹤筹和诗“重温旧梦抑何长，十次空登选佛场”³²，这些人多次应举终得偿所愿，而至科举废除，

²³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104页。

²⁴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53页。

²⁵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50页。

²⁶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86页。

²⁷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50页。

²⁸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中）》，第368页。

²⁹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35页。

³⁰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40页。

³¹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71页。

³²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52页。

仍有未获一第, 如张荣培和诗言“笑我青衫仍落拓, 尘残金线为人忙”³³。这些经历明显带有诗人个体的色彩, 呈现出他们自身对于科举的真实感受。

追忆往日, 往往会与当下产生鲜明的对比。自科举废后, 遂无新进的生员、举人与进士, 这些拥有科举功名的旧式文人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 如华世奎和诗“乡贡遂无新举子, 部民应念旧儿童”³⁴, 杨志濂和诗“科名草已无根久, 犹托苔岑映碧晖”³⁵, 表现出“我辈”孤掌难鸣的萧瑟感。特别是贡院等科举考试建筑的衰败, 更加增强了对科举制度中断的惋惜与昔日功名的眷恋之情, 如陈志喆和诗“祇叹锁闱成灌莽, 即论科第亦沧桑”³⁶, 刘燕翼和诗“试院已随荒草碧, 客楼犹近晚花红”³⁷, 为国抡才之地掩埋在荆棘灌木之中, 历史兴衰之感自然滋生。这与陈夔龙《连日与一山论诗感触科举停罢即步其韵》一诗颇为相似:

棘院沦为瓦砾场, 抡才不上至公堂。惊看燕麦园丁老, 回忆龙槐举子忙。

藻思迟速判枚马, 才名前后说卢王。纷纷新学今殊昔, 谁向燔余补缺亡?³⁸

参加科举考试是陈夔龙这群逊清遗老乃至旧式文人的共同记忆, 重宴鹿鸣唱和将这种个体隐微的情结放大, 凸显出他们内心对科举制度的眷恋及科举制度被废的惋惜。

³³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66页。

³⁴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156页。

³⁵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38页。

³⁶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53页。

³⁷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82页。

³⁸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中)》,第455页。

二、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与故国愁绪

陈夔龙重宴鹿鸣，藉诗酒唱酬来沟通声气，流露出新旧嬗变中“旧人物入新时代”的况味与感慨，科名荣光为故国愁绪所取代，被这些清遗民赋予忠贞节义的内涵，在他们眼中为“月泉、汐社中又增一故实”³⁹。

陈夔龙的重宴鹿鸣唱和，不仅表现出他对科举制度的眷恋之情，更反映出清遗民承续遗民的传统话语，表达类型化的遗民情感。遗民，本是指指在朝代更迭后依然眷恋旧朝的人，一般以是否出仕新朝作为判断的标准，他们以坚贞不屈的气节受到世人的敬仰。清遗民与中国历朝历代的遗民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民主共和取代封建帝制后，“无事二姓之嫌”⁴⁰已经在伦理道德上解开了他们身上的枷锁，但是他们依然秉持狭隘的忠孝节义观念，与新时代新社会的发展趋势相背，抱着顽固不化的守旧思想，拒绝接受民国的存在。辛亥鼎革，民国肇始，忠于清朝的官吏、文士以遗民自居，主要寓居在天津、青岛、上海与广州等地，除“留辮”“变名”“筑室”外，往往以诗酒唱和的形式来排遣故国愁绪，正如林正宏所言“清遗民藉由书写传达彼此的认同”⁴¹。在时人眼中，他们是落后的，特别是钱玄同等新文化人大力批判他们，认为“今之所谓‘遗老’，不问其曾‘少仕伪朝’与否，一律都是‘亡国贱奴’，至微至陋的东西”⁴²。但外在的环境并未影响清遗民的选择，他们大多坚持传统遗民的生活方式，书写内心的旧朝愁绪。陈夔龙“自来春申，日与二三遗老流连诗酒，自写河山故主之恩”⁴³，翻阅他辛亥以后的诗集，多“新亭泪”与“河山殊”之语。参与陈夔龙唱和的逊清遗民，虽无郑孝胥“民国乃敌国”的明确反对之语，但大多不问世事，藉诗酒唱和来排遣生活，如朱良敦“自辛亥以来，不问世事，惟以吟咏自娱，每一篇出，吴中诗社转相传抄，洛阳为之纸贵”⁴⁴；刘承干参

³⁹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28页。

⁴⁰ 陈翰一：《新语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03页。

⁴¹ 林正宏：《民国乃敌国：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59页。

⁴² 钱玄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出处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329页。

⁴³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42页。

⁴⁴ 孙雄：《旧京文存》，常熟：常熟孙氏刊本，1931年，第15页。

与周庆云组织的淞滨吟社,“有悲黍离麦秀之歌,生去国怀乡之感”⁴⁵;章棫“息影津沽,依故君以待死,其独抱冬心”。这些文人虽无参与清朝复辟的实际行动,但思想观念上较为保守,一直以宣统为正朔,眷恋前清。特别是溥仪民国二十一年(1932)就任伪满洲国执政,虽然“关内各地遗老,如陈夔龙、叶尔恺、刘承幹、朱汝珍、萧丙炎、章棫、黎湛枝、温肃、汪兆镛等等,都寄来祝贺的表章”⁴⁶,但是这些文人并没有北上投靠的实际行动,他们大多已经意识到民主共和取代一家一姓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甘隐沦作遗民以终老,祇自尽其为子为臣之本分”,借“每依北斗望清晖”⁴⁷“依斗心随北响鸿”⁴⁸,表达他们的臣子之情而已。

宋元之际,月泉、汐社这些遗民社团借吟咏酬唱表达鼎革之痛、易代之悲,清民鼎革之后,许多逊清遗民效仿它们,借唱和来沟通声气,促进遗民彼此之间身份的认同,如周庆云于沪上结淞滨吟社“仿月泉吟社之例,招邀朋旧,月必一集”⁴⁹,陈夔龙亦于1920年重开“逸社”,结“月泉吟侣”,书写故国情怀。诗词唱和在他们眼中已经不再是消遣之举,而是抒发旧朝愁绪的有效途径。尽管陈夔龙重宴鹿鸣是一次事件性唱和,并没有形成组织严密的文学社团,但是在唱和者的眼中它与那些遗民社团相似,甚至能为“月泉、汐社中又增一故实”。陈夔龙一再强调,自己的诗词创作“凡意有所欲言而不可言与不忍言,皆托诸吟讽”⁵⁰,这些“所欲言”者无非“屈子牢愁,少陵涕泪”。重宴鹿鸣唱和中原唱中有句云“月宫在昔香飘桂,云海而今劫换桑”“题名幸际升平世,说到先朝感喟长”,将“沧桑之感”“感喟先朝”引入,细腻隐微的表现出自己的旧朝愁绪。其他遗民也大多在唱和中沿着陈夔龙的思路,和作多有“甲子一周朝代改,工歌重与听笙簧”⁵¹“何须再作鹿鸣梦,忍看神州坐陆沉”⁵²之沉痛感,特别是他们以“黄花晚节”“后彫松柏”来自我勉

⁴⁵ 周庆云辑:《淞滨吟社集》,上海:吴兴周氏松坡室刊本,1914年,第3页。

⁴⁶ 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79年,第338页。

⁴⁷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89页。

⁴⁸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51页。

⁴⁹ 周庆云辑:《淞滨吟社集》,第3页。

⁵⁰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中)》,第406页。

⁵¹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56页。

⁵²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33页。

励，如程宗伊“喜闻草报春晖绿，老看花含晚节香”⁵³“心抱坚贞松柏健，枕流漱石赋诗忙”⁵⁴，张志潜“前度萍蒿传盛事，后彫松柏抱孤忠”⁵⁵，杨鼎元“节可傲霜如晚菊，心常捧日感沧桑”⁵⁶，高潜“耐寒而今知松柏，吁俊当年艳梓桑”⁵⁷，郑功懋“耆年不老松仍翠，晚节弥香菊自黄”⁵⁸，何福谦“寿介宾筵松柏翠，荣增老圃菊花黄”⁵⁹，正如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遗民情结’有赖于营造，赖于营造之后的不断提示、自我暗示，赖有意志与信念”⁶⁰，这些清遗民在群体性的诗词创作中不断暗示、提醒自己，促进遗民群体性的认同，强调遗民对于前清旧朝的缅怀。

尽管蔡云万《重宴鹿鸣唱和诗序》言“遗老想同情，应未忘成败兴亡之感”⁶¹，让读者下意识地觉得参与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的人均属遗民，但以是否“出仕新朝”作为判断遗民或非遗民的标准，参与陈夔龙唱和的人中其实有很多是非遗民，如严家识出任过国民政府财务厅厅长，金兆蕃曾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蔡毅仁反对帝制，刘学询与孙中山结盟，立志推翻清朝。爬梳这些非遗民的和作，其实与遗民的和作几乎毫无区别。这与“征和”的组织者陈夔龙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作投赠的对象是陈夔龙，和作的内容自然地聚焦在清遗民的身份，难免会沾染上几分旧朝愁绪的色彩。这种色彩的生成，主要得益于遗民典故、词汇的使用，如金兆蕃和诗“老圃香浓陶令菊，故山梦绕葛侯桑。月泉偶寄田园兴，愿借明公玉尺量”⁶²，使用典故“陶令菊”与“月泉诗”；蔡云万和诗“乱世难将理较量，年来变幻历沧桑”⁶³“遗老清风拟薇蕨，中原何日固苞桑”⁶⁴，用语词“沧桑”与典故“采薇”；

⁵³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92页。

⁵⁴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67页。

⁵⁵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83页。

⁵⁶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111页。

⁵⁷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114页。

⁵⁸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99页。

⁵⁹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102页。

⁶⁰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1页。

⁶¹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30页。

⁶²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131页。

⁶³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165页。

⁶⁴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170页。

刘学询和诗“甲子一周兴废感, 重听鹿鸣旧笙簧”⁶⁵“一病休官赋归去, 觚稜回首梦魂飞”⁶⁶, 用语词“兴废”“觚稜”; 蔡毅仁“蟾宫记取延龄药, 鲲海频看历劫桑”⁶⁷, 用语词“沧桑”。赵园曾言“‘遗民’是一种生活方式, 又是语义系统——一系列精心制作的符号、语汇、表意方式”⁶⁸, 这些非遗民使用遗民的话语系统来创作, 混淆了遗民与非遗民之间的界限。陈衍《石遗室诗话》就批判这一现象, 云:

自前清革命, 而旧日之官僚伏处不出者, 顿添许多诗料。“黍离麦秀”、“荆棘铜驼”、“义熙甲子”之类, 摇笔即来, 满纸皆是。其实此时局无故实, 用典难于恰切。前清钟虞不移, 庙貌如故, 故宗庙宫室未为禾黍也; 都城未有战事, 铜驼未尝在荆棘中也; 义熙之号虽改, 而未有称王称帝之刘寄奴也; 旧帝后未为瀛国公、谢道清也; 出处去就, 听人自便, 无文文山、谢叠山之事也。⁶⁹

清民鼎革, 遗民继续使用历史上积累的遗民话语系统, 难免会与时事相隔, 但是这些非遗民使用遗民话语系统, 多是由于唱和特殊的情境设置与文化场域。陈夔龙, 在重宴鹿鸣唱和时已经有意识地引领思潮, 如原唱“月宫在昔香飘桂, 云海而今劫换桑”“题名幸际升平世, 说到先朝感喟长”, 将六十年沧桑记忆融于此时此刻, 回顾清末民初的历史变局, 特别是他于同年重宴鹿鸣会上所观之剧“红豆馆主以昆剧弹唱《天宝遗事》”⁷⁰, 更是借剧言情, “开天往事忍重论, 秋晚江南怆客魂。未仿龟年弹一曲, 天涯芳草怨王孙”⁷¹, 眼中景与心中景重合, 身世之感油然而生, 将重宴鹿鸣唱和奠定故国愁绪的基调。受陈夔龙原唱的影响, 和作沿着他的方向, 表现出鲜明的旧朝愁绪。“黍离”“采薇”“义熙”“挥戈”等典故频繁出现在唱和中, 如吴郁生和诗“帐触秋风东海客, 钟山愁咏黍

⁶⁵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96页。

⁶⁶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173页。

⁶⁷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99页。

⁶⁸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244页。

⁶⁹ 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⁷⁰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167页。

⁷¹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中)》,第395页。

离篇”⁷²，王源瀚和诗“往日莘蒿乡国梦，故宫禾黍老臣心”⁷³，徐公修和诗“蕨薇采罢莘蒿食，风味犹余尔许长”⁷⁴，吴瑞汾和诗“身世义熙增感慨，赋诗奏韵胜笙簧”⁷⁵，王念曾和诗“望京依斗江湖思，早晚阳戈返鲁晖”⁷⁶，杨志濂和诗“攘夺纷纭不可量，义熙甲子在柴桑”⁷⁷，在唱和诗词文本上消弭了政治立场上的分歧，难以判断具体的身份。

诗词唱和，能够有效地与现实环境隔绝，形成相对独立的交流空间。清遗民沉浸于自己构建的遗民文化生活中，与现实的政治存在着明显的距离。无论是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与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在他们的唱和中几乎都找不到明显的痕迹。陈夔龙等清遗民认为自身延续了中国遗民文化的传统，在创作中自觉地使用遗民的话语系统，而那些非遗民参与遗民为主体唱和活动，受整体环境的影响，自觉地使用带有遗民色彩的典故与词汇，两者共同地在唱和文本中表现出旧朝的眷恋与惆怅。这种故国愁绪虽然是遗民身份的自我表达，与历朝历代遗民表现出相似的特征；但是在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是与时相逆，呈现出清遗民保守落后的历史缺陷。

三、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与文化情怀

时至今日，上距五四新文化运动已有百年，经过岁月的沉淀，回溯辛亥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免有些矫枉过正的感慨。虽然这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不应该加以苛责，但是重新审视清遗民这些“为古典政制和古典文化守灵的知识精英”⁷⁸，挖掘在他们身上被历史遗忘的文化遗产，有利于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在清

⁷²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73页。

⁷³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128页。

⁷⁴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167页。

⁷⁵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73页。

⁷⁶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66页。

⁷⁷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165页。

⁷⁸ 朱兴和：《现代中国的斯文骨肉：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6页。

遗民政治、文化失势的背景下, 坚持中华文化的立场, 延续古典诗词的创作, 表现出对以经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失传的担忧, 这其中亦有难能可贵之处。

陈夔龙为代表的清遗民乃至旧式文人以旧体诗词唱和沟通声气、相互砥砺, 客观上在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文化转型中, 在白话与文言、新诗与旧诗矛盾与争讼的演进过程里, 保存了旧体诗词创作的薪火, 延续清代诗学发展的脉络。新文学的发展建立在旧文学的批判上,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 凡属贵族文学, 古典文学, 山林文学, 均在排斥之列”⁷⁹, 因为“贵族文学, 藻饰依他, 失独立自主之气象也; 古典文学, 铺张堆砌, 失抒情写实之旨也; 山林文学, 深晦艰涩, 自以为名山著述, 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 旧文学在新旧文化更迭的历史进程中面临淘汰的威胁, 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中诸如钱玄同提出“欲废孔学, 不可不先废汉文, 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 尤不可不先废汉文”⁸⁰, 甚至鲁迅亦曾言“汉文终当废去, 盖人存则文必废, 文存则人亡”⁸¹, 将汉字与旧思想、旧社会等同, “新旧之间, 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⁸², 试图以摧枯拉朽的方式斩断旧文学与当时社会的关系, 借西方文学来构建现代白话文学, 从某种程度上抛弃了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根。直接的结果就是“十余年来, 所谓爱国革新之新文化运动, 已使文言书少人读, 旧体诗少人做”⁸³, “新文化运动后, 国内青年竞喜为白话诗”⁸⁴。当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落下, 这些引领时代风气的人物以理性的态度重新思考新、旧文学的关系, 鲁迅就曾写道“新文学在外国文学的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 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 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⁸⁵。除林纾、严复外, 大多数清遗民乃至旧式文人对新文化运动保持沉默的态度, 拒绝与新时代、新思潮产生直接的联系, 固守自己的创作传统。杨萌芽曾指出“中

⁷⁹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 1917年, 第6期。

⁸⁰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出处《钱玄同文集》第1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 第166页。

⁸¹ 鲁迅:《致许寿裳》, 出处《鲁迅书信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年, 第20页。

⁸² 陈独秀:《陈独秀答言》, 出处周月峰编:《新青年通信集》,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年, 第103页。

⁸³ 吴宓:《吴宓诗话》, 吴学昭整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 第255页。

⁸⁴ 王培军编:《校辑近代诗话九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第234页。

⁸⁵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 第111页。

国古典诗派在新文学的猛烈抨击下之所以不绝如缕，与陈三立等老辈诗人的努力有关”⁸⁶。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借自己重宴鹿鸣的契机，征和海内，并刊刻成《庸庵重宴鹿鸣集录》，“质之海内诸君子，非敢敝帚自享也”⁸⁷，是延续中国文人唱和的传统，以吟坛盛事的方式推动旧体诗词的创作。唱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活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表现着中国传统文人“雅化”的生活态度。张寅彭言：

民国时期，西学大炽，诗与诗学遂有新旧之分。近百年来，一般认识总是视新、旧诗为对立，互为排斥，形同水火，且以新压旧，以至这一时期的旧体诗词创作，以及旧体诗为评述对象的诗话，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湮蔽不彰的状态之中，虽距今不远而已如古物，沦于待发掘、待整理的命运。⁸⁸

清遗民及旧式文人，他们受到传统的写作习惯、旧的文化立场限制，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逆流，延续着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道路，他们的创作并非是胡适所言的“贗鼎”，毫无存在的价值，而是中国古典诗学的宝贵财富。

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通过对科举考试的回顾，表现出以经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在西学东渐、新旧交替的背景下失传的担忧。自近代以来，中国在器物、制度、思想上向西方学习，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有着“全盘西化”的倾向，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度后，以经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面临着失传的威胁。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除，新式学堂的日渐普及，“自学堂以兴，教科书为重，四书不读矣，五经不讲矣，六经弃若弁毛，十三经束诸高阁”，原本作为考试用书的四书五经逐渐被学堂编纂的教科书所取代，特别是辛亥鼎革后，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之初便发布命令，全国的中小学废止读经，将“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

⁸⁶ 杨萌芽：《古典诗歌的最后守望：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⁸⁷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中）》，第364页。

⁸⁸ 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册，第4页。

废止之”⁸⁹, 依据现代学科体系, 在大学教育中将经学一科分入文、史、哲三科中, 经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主要内容, 骤然间由神坛坠入凡尘。

科举借制度的保障, 将四书五经作为考试内容, 维护了经学在封建帝制时期的正统地位。晚清废除科举后, 学校设置“读经”课程来维系经学的延续。但自辛亥以来, 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经学因与封建帝制、传统伦理道德紧密联系, 成为批判的重点对象。废除学校“读经”课程与取消经学独立分科已经使得经学濒临失传。陈瀚一就曾言:

共和之兴廿余年, 学术益纷如乱丝。恐更阅十载, 将使琼林槩委弃于泥沙粪土中, 熟视无睹。是吾国灿烂光华之古学, 不亡于历代专制之朝, 而亡于今日共和之世, 不尤重可哀耶?⁹⁰

经学是中国特有的学术门类, 它区别于文学、史学、哲学的西方学科体系, 按照西方的划分标准, 实则使得经学面临消亡的命运, 蒙文通就曾对此加以批判, 认为“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 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 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⁹¹。以遗民为代表的旧式文人在重宴鹿鸣唱和中多表示自己的担忧, 如戴振声和诗云“太息五经今扫地, 士憎多口巧言簧”⁹², 张志潜和诗“人已卅年忘祖典, 天留一老炳文光”⁹³。陈夔龙亦言“迄至学校, 废经不读而经亡, 经亡国亦随之”⁹⁴, 他将经学视作为国家存亡的关键, 从某种程度上, 这里的“国”等同于顾炎武所说的“天下”, 失去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根基, 中国就如流失源、如木失根, “衣冠礼义之邦, 将成为兽蹄鸟迹之区”⁹⁵。蔡元培在清民社会政治、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 强调“学校之

⁸⁹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出处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年, 第741页。

⁹⁰ 陈瀚一:《本志出世之微旨》,《青鹤》1, 1932年, 第1期。

⁹¹ 蒙文通:《蒙文通全集》第3卷, 成都: 巴蜀书社, 1995年, 第150页。

⁹²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 第1069页。

⁹³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 第1083页。

⁹⁴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 第648页。

⁹⁵ 朱克敬:《柔远新书》。出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编,《历代边事资料辑刊》(第五册), 北京: 北京图书

中，初有读经一科，而后乃废去，亦自千九百年以来积渐实行，亦教育界进步之一端”⁹⁶，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举措，但在清遗民眼中却不是如此，如章钰认为“一姓兴废，本天道之适然。独恨立国五千年，凡夫制度，文为声名。文物所以殊异遐裔，而自别于禽兽者，无不颠倒摧毁，随之而尽”⁹⁷。刘大鹏亦认为“民国教育似乎大有进步，实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惟重科学，不读经书，不惜廉耻，五伦破坏，八德沦亡而已”⁹⁸。经学维系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立身之本，废除读经几乎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断裂。陈夔龙等人在唱和中往往将自己视为旧式道统的传承人，维系“斯文”不坠，可与汉代传经继学的伏生相媲美，如徐制凤和诗言“谁为斯文存硕果，天留此老亦多情。一庐人境陶彭泽，九黜经师汉伏生”⁹⁹。这点亦在彭少湘等人的重宴鹿鸣唱和中得到佐证，如石广权云“带索启期三乐事，传经伏胜一书生”¹⁰⁰，方永远言“九秩经师希世珍，伏生而后有斯人”¹⁰¹。“人家渐少读书声”¹⁰²的背景下，逊清遗民乃至旧式文人面对以经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日渐凋零，他们自觉肩负起延续道统的重任。

王汎森认为我们现代研究者“无须同意其政治认同”¹⁰³，但可以通过“检视清遗民的行为与动机”来“丰富我们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脉络的了解”。清遗民乃至旧式文人“窃窃以国粹丧亡为患，杞忧不已，敝帚自珍”¹⁰⁴，将以经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视为绝学，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正如胡思敬所言“死所既不可得，留此明夷待访之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代开太平，不必在位始有为也”¹⁰⁵，在文化断裂的历史情境下，坚守阵地，维系文化传统。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并不能简单地视作为逊清遗老的无聊之举，它“犹有科名

馆出版社，2005年，第451页。

⁹⁶ 蔡元培：〈一九〇〇年以来教育之进步〉，出处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第741页。

⁹⁷ 章钰：〈致缪荃孙札〉，出处顾廷龙校：《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88页。

⁹⁸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2页。

⁹⁹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094页。

¹⁰⁰ 何广权：〈恭祝彭少湘先生重宴鹿鸣并九秩大庆诗〉，《孔道期刊》，1936年，第8-9期。

¹⁰¹ 方永远：〈恭祝彭少湘先生重宴鹿鸣并九秩大庆诗〉，《孔道期刊》，1936年，第8-9期。

¹⁰²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第1122页。

¹⁰³ 林正宏：《民国乃敌国：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第2页。

¹⁰⁴ 王易：《国学概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40年，第1页。

¹⁰⁵ 胡思敬：《退庐笺牍》，南昌：南昌退庐刊本，1924年，第14页。

佳话, 助谈于斯文将坠之余”¹⁰⁶。在新旧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下, 表现出遗民乃至旧式文人维护传统文化的坚定态度。

余论

科举情结、旧朝愁绪与文化情怀, 三者和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中紧密联系, 难以分割, 这也是民国时期周甲重游类唱和的共有特征。陈夔龙重宴鹿鸣唱和, 尽管带有传统唱和诗作整体成就不高, 名篇佳作稀少的缺陷, 但“旧人物入新世界”, 赋予了它在文化上的特殊价值。它与其它周甲重游类唱和, 共同表现出在西学东渐、新旧交替历史背景下这些遗民乃至旧式文人的真实心态。目前对于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大多止步于 1905 年废科举, 而后科举时代的研究尚待深入, 民国时期周甲重游类唱和集存世丰富, 借此可以管中窥豹, 从唱和这种群体性活动中探索旧式文人的隐微心态。

参考文献

-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 李立朴、徐君辉、李然编校,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4 年。
- 林正宏:《民国乃敌国: 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年。
- 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
-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
- 杨萌芽:《古典诗歌的最后守望: 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研究》,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1 年。
- 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 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
-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 朱兴和:《现代中国的斯文骨肉: 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研究》,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年。

¹⁰⁶ 陈夔龙:《陈夔龙全集(下)》, 第 1030 页。